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资本的辩证作用 与耐心资本的发展理路^[*]

陈绍辉, 孙熙国

(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以增殖为逻辑、以商品为物质载体、以生产实践为中介的运动着的价值,在客观上发挥着调节社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分配和流通的职能,具有“资本的文明面”和资本文明悖论的双重作用。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发展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更为理性的资本形态,以长期视角、价值共创和稳健持守为核心内涵,强调长期投入、风险管控以及预期稳定的资本回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壮大耐心资本,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关键词]资本;耐心资本;政治经济学;新质生产力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9.0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强调“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2]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耐心资本的出现,既是对当前经济发展境遇的回应,也是对传统投融资模式的反思。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形态,以长期视角、价值共创和稳健持守为核心内涵,这不仅对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

作者简介:陈绍辉,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熙国,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理论研究”(21CZZ001)的阶段性成果。

重要指引,也为中国特色金融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确立了重要遵循,有利于克服资本短期化和投机化倾向,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3]是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水平的“真经”和看家本领。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资本要素、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厘清新时代“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4]和当前阶段壮大耐心资本的逻辑理路及其培育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资本及其双重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科学,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核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资本的积累过程、剩余价值的产生机制以及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等核心概念,为理解和把握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理解和把握资本的两种进路:资本的经济学意义与人类学意义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理解和把握“资本”,存在经济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两种进路。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更高效地聚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是为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需求而产生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6]马克思系统考察货币、资本、商品流通的内在联系后,深刻洞见了资本的历史生成、社会起源和一般特征。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7]这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最初以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呈现,意味着资本最一般的形式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商品经济过程;此外,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昭示了资本是为了适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组织方式。因此,在“资本一般”意义上,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生产和组织方式,是生产、交换不断扩大的必然产物。

从人类学意义上看,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一般”的同时,着重研究了资本的社会历史性。资本不仅通过劳动生产更广泛的劳动产品和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交换价值和价值,即人之间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马克思首先通过对商品流通公式与资本总公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之间的质的差别: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是货币能买到劳动力商品。“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8]资本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是从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走向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必然产物。人要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先发展出普遍联系的社会关系,然后才能把它置于自由人联合体自觉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而资本是促进这一全面关系的重要工具。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向度,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的双重驱动下,从原始自然崇拜的枷锁中突围,以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开辟了物质文明新领域,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0]极大推动了“历史向世

界历史转变”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向度,虽然资本仍然是以剥削剩余劳动为自身增殖的基本手段,但相较于以往的所有剥削方式,其显然有所进步,在资本要素的驱动下,“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被不断超越,把人从封建的、神学的、宗法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克服了旧的意识形态,推动了人的政治解放,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还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1]由此可见,资本在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无意地生产出了这些文明的副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2]

(二)资本的双重作用: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与资本逻辑的“文明悖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3]资本在促进生产力繁荣发展和人的政治解放的同时,也将人和社会推向全面异化的境地。

一方面,就资本的“文明作用”而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4]“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5]

其一,资本有利于促进生产资料的集中和规模化生产。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家能够集中大量的生产资料,进行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如货币成为资本时,“事先要求把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原料、劳动工具游离出来”^[16]一样,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进行生产的前提就是“要能靠利润生活和能够积累,资本的利润就应当等于许多同时并存的活工作日的剩余时间之和”,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规模化生产,“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7]

其二,资本推动了社会关系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会将资本投向国外,进行跨国投资和生产,“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8]跨国投资和生产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资本使得原本在“共同体尽头”才能从事的交往行为扩大到世界市场,所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具有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资本的世界主义本性使其瓦解了一切民族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生产方式,使世界联为一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20]

其三,资本有利于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上的权力,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时,资本的发展也促使工人阶级不断觉醒,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生存状态,资本“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1]促使人获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就资本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而言,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表现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以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资本的积聚是指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增大其规模;资本的集中则是通过竞争和信用等手段,使若干个较小的资本合并成一个较大的资本。在这一过程

中,资本家的财富不断增加,而无产阶级却面临着失业、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等问题,“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2]引发了经济悖论、人口悖论、自然悖论等文明悖论。

第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和人的异化。资本的本质在于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此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剥削关系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加剧。随着私有制的深入发展,社会大分工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进程加深加快,“货币—资本”共同体形成,先是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23]尔后成为资本的货币变成共同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4]《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以自身为逻辑建构出“大写的主体”并僭越真正主体成为共同体中支配一切的主体的过程,而真正的主体——人——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其本质的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25]而资本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人则陷入了全面的异化: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

第二,资本在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容易走向集中和垄断。垄断资本家一旦掌控了市场,资本的增殖逻辑就会成为主宰,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围绕着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运转。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6]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生产中的真正主体神秘化、抽象化为一种超验力量,人和人之间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增殖逻辑主宰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当表现为财富的资本被少数人占有,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就异化为私人权力,这种少数人日益庞大的私人权力与多数劳动者相对立而存在。特别是资本循环周期与利润的正比关系,促使资本越来越快地加速运转,而人的生活显然也越来越被裹挟进这架极速运行的大机器,原子化侵蚀社会化,物的大繁荣伴随着人的单向度,人越来越多地“拥有对象”——日益繁盛的消费品,但越来越“丧失自我”——个人生活的全面异化。

第三,资本加剧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冲击。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27]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使资本最大可能地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盲目逐利性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但由于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有限,导致生产过剩、商品滞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利润而非使用价值,导致“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8]“人不断异化为单向度的人”,^[29]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综上资本的双重作用可见,一方面,资本既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分工和交换不断扩大、社会化协作普遍展开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历史体现,并且资本的出现和发展会促使分工、交换和普遍性生产协作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资本的出现也标志着人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但是,如果因为后一方面消极作用,而过早地、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资本,则是不现实且不可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把价值批判和事实批判结合起来,既以历史主义的、发展的眼光肯定资本的巨大历史意义与作用,肯定资本在人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具有不容否认的进步意义,同时反对和批判把资本视为天然

合理的、符合人本质属性的永恒条件和把资本关系自然化、永恒化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开了被物与物关系的迷雾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深刻揭露了资本的剥削本质及其历史暂时性。资本作为生产发展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它并非不可超越。随着生产的持续推进以及社会系统中各类要素的不断增长与变化,资本必将被更高级的形态所取代。

(三)突破资本异化逻辑的关键: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地驾驭和运用资本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突破资本的异化逻辑、创造更高形态的资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二是主动变革生产关系以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如果说资本的使命是促进社会化的生产力大发展,同时创造出以普遍的社会分工交换协作为基础的广泛且全面的社会联系,那么,一旦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后,其狭隘的历史局限性必将充分展露,作为生产力继续前进的阻碍因素而被扬弃。如前所述,资本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中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而且这一力量是人类在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进程中造就的、与人相对立的、主宰着人本身的社会存在。在此意义上,资本是人类活动的不自觉的产物。克服这一产物的异化逻辑,仅仅在意识中复归自己的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呼唤主体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现实中能动地、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地驾驭和运用资本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0]因此,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就是通过对资本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把客观存在于社会过程中的因果性转变为以人们的需要、意志和合理计划所自觉控制的因果性。

由此可见,把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是人类社会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资本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在新时代条件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就是要既不听任资本增殖逻辑的肆意泛滥,又不像对待敌对力量那样任意打击和拒绝资本,而是通过政策引导、法律规范、价值导向引领资本发展方向,限制资本的局限性,引导资本回归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本性”,摆脱异化造成的“物对人的统治”,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激发资本的生产活力和文明张力。

三、耐心资本特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培育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形态,既与资本及其本质具有一致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31]。诚如其言,耐心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态,仍然具有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本质属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32]。耐心资本参与到生产或投资活动中,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取回报,实现价值增值,但是,耐心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其注重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急功近利、快进快出、挣快钱的短期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耐心资本就是投资者自愿向接受国或者发展伙伴注入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持有者通常有较好的能力与发展伙伴一起承担风险”,^[33]进而让投资者及其发展伙伴获得双赢。由此可见,耐心资本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长期投资视野、对风险有较高容忍度、注重社会和环境效益并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

或项目治理的投资资本。

(一) 耐心资本特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首先,在资本积累向度上,耐心资本具有长期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耐心资本通过长期投资促进资本积累,进而调整产业形态和经济结构,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模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有了耐心资本的投入,企业可以更加自如地开展技术研发、设备更新等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同时,耐心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方向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如果耐心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科技创新领域等,则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耐心资本过度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也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

其次,在生产关系向度上,耐心资本具有正外部性,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出积极的溢出效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处于主导地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耐心资本的出现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关系的调整。例如,一些耐心资本可能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员工利益,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推动企业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员工待遇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作用和性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引导耐心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增强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和金融市场的深度韧性,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有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34]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引导耐心资本投向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和项目,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规范耐心资本的投资行为,确保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再次,在价值规律向度上,耐心资本具有相对稳健、抗风险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也需要遵循价值规律,即要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判断。只有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项目,才值得耐心资本的投入。“在市场低迷或不确定时期,耐心资本往往能够逆周期布局,抓住长期投资机会。”^[35]一方面,耐心资本的长期支持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短期的经济困难,使企业能够更加稳定地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导向、社会责任等,这可能会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规律的要求。

最后,在资本的社会功能向度上,耐心资本同样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强调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展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时刻警惕资本“文明悖论”的消极作用。耐心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其在促进技术创新、培养新兴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耐心资本不再仅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是更加注重资本的社会效益和长期价值,它以全新的视角和理念,引导资本流向那些既具有经济潜力又能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领域。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仍然存在,即使是耐心资本也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耐心资本过度追求投资回报,可能会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带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国家需要对耐心资本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引导,为包括耐心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形态设置红绿灯,“‘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36]

使其更好地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无序扩张、减少其消极影响。

(二)耐心资本的作用

其一,耐心资本能够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促进对生产要素的激发。首先,耐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土地、技术、劳动力、管理、数据等其他要素相互促进,能够克服传统资本急功近利的弊端,在更长的生产周期内调适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它较少受到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能够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保障企业研发、生产、运营等活动的持续开展,帮助企业度过艰难的起步阶段,避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夭折。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37]在此基础上,耐心资本能够激发劳动、知识等生产要素,引导其他资本流向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促进关键核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二,耐心资本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而耐心资本正好具备长期投资的特性,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耐心资本确实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关系型债务的作用大于稳定型股权。”^[38]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在耐心资本的支持下,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耐心资本依照政府的引导,围绕这些产业制定了早期投入、长期布局的策略,并遵循科技创新的规律,坚持长期主义,对失败持宽容态度。

其三,耐心资本有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中,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可能会引发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39]耐心资本作为一种长期投资资本,其投资决策基于长期价值,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盲目跟风抛售或追涨,能够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市场出现短期大幅下跌时,耐心资本可能会继续持有优质资产,避免市场过度恐慌和抛售行为的加剧。

其四,耐心资本具有激活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是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换挡期背景下,以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科技含量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主要内涵,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挥长期耐心资本作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40]越来越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识。耐心资本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企业、投资者和社会的多赢局面,促进科技从业人员以及生产经营者在相对宽松、更富创造性的环境氛围中进行价值创造,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持续发力。“耐心资本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认可,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理想投资世界’的新形态,也是长期主义哲学理念在金融界的投射”。^[41]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耐心资本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回报空间,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

(三)耐心资本的培育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中,耐心资本具有长期投资属性、较高风险承受力、稳定收益以及战略资本价值体现等特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壮大耐心资本。

第一,坚持党管金融,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引导和规范耐心资本健康发展。在引导耐心资本的过程中,首先,党管金融能够确保金融发展方向正确。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其

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把握经济发展的大局。其次,有效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耐心资本流向最具潜力和价值的项目和企业;而有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手段,对耐心资本进行引导和规范。需要注意,当资本反客为主、僭越为目的本身、反噬劳动和人的主体地位时,资本的“暂时的必然性”就必须得以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逻辑,既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新时代,发展耐心资本,发挥耐心资本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耐心资本的投资范围、投资方式、监管要求等,为耐心资本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及时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加强对耐心资本投资活动的监管,防范投资风险,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投资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提高投资活动的透明度,增强市场的信任度。

第二,积极推动金融资金转型,引导金融资金从短期投机向长期投资转变。耐心资本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相呼应,即短期投机和资本流动性过高可能加剧市场波动和经济不稳定。而耐心资本所具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有助于缓解这种不稳定因素。耐心资本在追求长期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此,一方面,我们要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大对长期项目的投资力度,提高长期资金的供给规模和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创投资本的来源供给、税收制度及主体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激发创投资本的活力。正如2024年9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的,“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43]另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加强投资者教育,培育长期投资文化,提高投资者对长期投资价值的认识,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避免短期投机行为。

第三,健全耐心资本的体制机制,适时调适同耐心资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既吸纳包括资本文明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又超越资本文明弊端,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在这里有必要区分资本、资本要素和资本主义,资本在原初本质上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本不具有政治属性或道德层面的价值属性,而且作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资本为社会共同体现代形态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资本僭越了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工具地位而成为一种“主义”,即将资本上升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要素,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已不是仅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且以自身为逻辑掌控整个共同体时,即当共同体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时,这种被资本支配的社会共同体则是虚幻的共同体。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44]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具体国情走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导资本的自然属性、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激发活力,又保障秩序;既促进效率,又维护公平;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敢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刀刃向内,又通过顶层设计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永续发展。这条道路将继续引领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四、结 语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又结合现代经济的发展特点,提出了新的治理理念、资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资本治理模式——耐心资本,这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需,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原创性发展。耐心资本理念的提出及相关政策的落地,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政府引导下的耐心资本有利于使资本回归到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本质”,摆脱因异化而产生的“物对人的统治”,深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激发资本的生产活力与文明张力,使资本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发展。

注释:

- [1][39]《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 [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人民日报》2024年5月1日。
- [3]《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 [4]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求是》2024年第10期。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0页。
- [6][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05页。
- [7][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374页。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3页。
- [9][18][19][21][22][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404、404、403、51、51页。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9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 [14][20][26][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5、509、707、83页。
- [1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7-928页。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 [23][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1、486页。
- [24][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9、62页。
- [29]孙熙国、陈绍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 [31][32][36]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 [33]林毅夫、王燕:《以耐心资本作为比较优势审视发展融资》,《金融博览》2018年第8期。
- [3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
- [35]曾梦宁:《推动耐心资本向“新”而行——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中国金融家》2024年第7期。
- [37]姜中裕、吴福象:《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 [38]吴旻佳、张普、赵增耀:《耐心资本、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的数据》,《科学决策》2022年第9期。
- [40]李丹:《壮大耐心资本解决创投“缺长钱”和“无米下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相关负责人解读创业投资新政》,《中国金融家》2024年第7期。
- [41]王文、刘锦涛:《壮大耐心资本的意义与路径》,《中国金融》2024年第10期。
-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185页。
- [43]《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措》,《人民日报》2024年9月19日。
-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5页。

[责任编辑:刘 莹]